

血染东南半壁红

——记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壮与荣光

□钟燕林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亿万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也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

有这样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北上征战闽浙皖赣四省,行程56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他们以“血染东南半壁红”的英雄壮举,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第一缕红飘带”。

国家危难 中华苏维埃高举抗日旗帜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连失利。至1934年5月,广昌、筠门岭等南北门户均被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被压缩至极小范围。

为牵制敌军,1934年7月,中共中央将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先行北上抗日。

此举的主要目的,一是“以实际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二是“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三是“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

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历经坎坷,当初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大田、古田等县,1934年8月1日攻克福州西郊的水口。接着,先遣队向闽东进军,攻克罗源县城。随后又向闽北前进,经宁德、福安进入浙江。此后,进入遂安,9月底到达婺源北境。10月21日,又奉命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移,经浮梁、德兴交界地带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到达德兴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两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的命令,先遣队与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分任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师长,粟裕改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

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红十军团举步维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等在玉山县院首村高竹山被捕,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征程就此止步。先遣队余部后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刘英率领进军浙西南,在那里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浴血奋斗 先遣队将士尽显革命本色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誓师北上,一路转战,栉风沐雨,书写了一段悲壮雄浑的革命史诗。先遣队全体将士信念如磐,积极乐观,彰显了高尚的

革命情操。

1935年1月,方志敏与粟裕等人率领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到达江西德兴陈家湾村。然而主力部队因被敌人包围,未能冲过封锁线。此时,敌军有14个团在方圆不过15里的地区驻守。生死关头,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部先行突围,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再度冲入敌军包围圈,寻找和组织主力部队进行突围。突围失败后,方志敏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用一颗赤诚之心和一支激昂之笔为党工作,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献给党。在被关押的6个月时间里,方志敏写下了13万多字的文章。他写道:“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对革命的执着,日月可鉴。

乐观的革命情怀,是革命志士的豪情。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行军时跑前跑后,深入连队,救护伤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在谭家桥战斗中,刘英身负重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但他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部队药品奇缺,连局部麻醉药品都没有。但刘英以坚强的毅力,忍受剧痛配合军医顺利完成了手术,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红军关公”。

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刘英的伤口迟迟未能痊愈,日渐消瘦,可他仍像往常那样,一路上给士兵们讲故事,还扯着嗓子,唱起他老家瑞金的山歌调子。为了鼓舞士气,他向大家讲:“我们搞革命,就像生这木炭火,生火时难免有点困难,生着了就会越烧越旺。”听了他的话,战士们心中顿时亮堂起来。正是因为刘英等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先遣队的将士们始终保持乐观、坚定的信心。

播撒火种 先遣队北上功不可没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转战闽、浙、皖、赣等地区,积极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宣传了抗日主张。从瑞金出发伊始,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携带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近160万份宣传资料。在先遣队将士看来,这些都是党的声音,而将党的主张传播出去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所以,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广泛张贴、散发宣传资料,大造抗日声势,将军事行动和政治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先遣队沿途组织群众大会宣讲,街头演讲,写标语,深入农村、工厂散发和张贴宣传文件和传单,并用沿江河流牌宣传和信件带宣传品等方法广泛宣传,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及反共卖国行动,对唤醒民众、团结抗日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扩大了政治影响。正如粟裕所说:“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还亲自为伤病员担抬担,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时任红七军团保卫局机要秘书的龙跃在《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这样写道:“红七军团经过闽东,沿途散发了《告农民书》《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传单,系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反蒋、拯救中华的主张,给了闽东党政军民政治上思想的很大教育和鼓舞。”

播下了革命火种。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行军过程中,宣传抗日主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展示了革命队伍的政治素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11月23日,先遣队途经浙江淳安县白马地区,一些战士吃了老百姓的粽子后,小心翼翼地把铜板和白洋包成五角星状的粽子放回原处。回到家的百姓打开一看,里面裹的竟是铜板或白洋,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洋钱粽”,发自内心地认为先遣队是为民爱民的好队伍。

“洋钱粽”的故事在淳安广为传颂,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依然对先遣队的优良作风和亲民爱民情怀赞誉不断。先遣队所到之处,在战斗间隙严打土豪劣绅,并将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红军的感召下,不少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队伍。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有效调动敌人、分散敌人、钳制和拖住敌人,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之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同时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



姚名达在宁都翠微峰。(资料图片)



姚名达。(资料图片)

笔戈墨锋抗敌寇

——记『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

1937年7月7日,山河破碎,战火硝烟骤起;半壁沦丧,四万万人奋起!除了无数爱国将士在战场上的拼杀,文学界、艺术界乃至民间百姓也以笔为枪、以血为墨,救亡的洪流已席卷神州。在这之中,有一名教授喋血课堂外,壮烈殉国,被誉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他,就是姚名达,当日寇举起刺刀,他挺身为盾、血沃赣鄱,以生命完成了人生最磅礴的文稿。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1905年3月17日出生于兴国县南门外竹坝村。年少时,姚名达家中颇为清贫,仅有薄田数亩,经史子集类的古书倒是有几千册。6岁时,姚名达的父亲便开始教他识字读书。他天性聪颖,不久便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爱好钻研地理书籍,常自绘中外地图,研究山川地势。

1923年6月,姚名达自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今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读,转向学习医匠,然而他内心割舍不下的仍是史学。不久,姚名达听闻上海南洋公学开设国学专修科,并可享受公费待遇,欣然前往就读,肄业。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研究院,姚名达北上进京应考,被录取为该院第一届新生,师从梁启超,从此走上了治学之路。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9日,姚

名达供职的、在世界出版业久负盛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本军机滥炸。次日,姚名达位于上海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寓所也毁于日军炮火,他保存的大量书稿及参考资料也随之全部被毁。

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姚名达的极度愤慨,他写文章怒吼道:“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目录学·自序》)此后数年,姚名达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分析抗战形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5年6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姚名达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书,主张唤起群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2月,他又与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应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

在1936年《女子月刊》的元旦特刊上,姚名达一连发表《国难的由来和现状》《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等5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盛赞“一二·九”运动中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牺牲精神,称这种精神“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闻风丧胆”,“使敌人知道我们民众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中华民族不是容易欺侮的”,号召“有热血的国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有的则从经济视角深入剖析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动因。

姚名达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后转向华北,是因为华北的资源(如棉花、煤炭、小麦等)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例如,1934年华北棉花产量占全国43%,羊毛出口占91%,煤矿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而东北的资源无法满足日本需求。此外,日本通过铁路网络控制华北资源,所谓“防共”和“自治”只是掩盖经济掠夺的借口。文章中,姚名达以史学家的严谨,辅以他自绘的物产分布图和详实数据,非常直观地揭露了日本侵略我国,掠夺我国资源的经济与战略本质。

1937年7月15日,姚名达在《女子月刊》(第5卷第7期)发表了《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一文(因《女子月刊》被迫停刊,原文打算写五节,只发表了前两节)。他敏锐地觉察到:“卢沟桥事件关系最大”,“中日必战!”

文章全面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一周以来的抗战形势,他说:“历史上的战争都由于争利,日本所以再三再四侵略我国,亦无非因为夺取资源与市场……从资源的夺取战略看来,日本势必侵略出产煤、棉、盐、麦最丰富的华北各省。”姚名达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永无满足”的,“除非中国给他以重大的打击,否则不吞并不全国不止”。他大声呼喊道:“我们要生存,不可不抗战。唯有抗战才能换取生存。”“亲爱的同胞,是抗战的时候了!起来!”

1937年7月19日,姚名达和继配夫人巴恰南在杭州订婚。8月5日上海《大公报》刊出了标题为《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的头条新闻。新闻中说:“……本报昨接xx君及xx女士以其订婚戒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原函摘录如下:……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们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戒指捐献……为备抗战之用……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信,正是姚名达和巴恰南所写,为了抗战,他们把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的订婚戒指毫不犹豫地献出,并且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这种精神更激发了爱国民众的抗战决心。

1939年5月,姚名达发表《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一文,从史理学与地理学的角度,对日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姚名达认为,“综合比较,无论敌欲采取何种战略,皆有极多困难”“即从地理学原理推断敌军无进攻之能力,再从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之必败”。之后的抗战形势证实,他的预测与推断,是完全

正确的。

同年6月,姚名达又发表了《日本南侵的政略与战略》(1939年《闽侨月刊》第4期)一文。此文分析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双重政策,即大陆政策(西进)与海洋政策(南进)。姚名达认为,日本表面侧重大陆政策,实则两者互为补充。他警告欧美国家不要低估日本南侵的野心,指出南洋资源(如气候适宜移民、可作倾销市场)对日本同样关键,并呼吁南洋侨胞和欧美国家警惕日本的扩张计划。

1940年,姚名达在《江西的潜力》一文中,号召国民“振作民族精神,应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都激发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继为文史系教授。

1942年5月,日寇攻陷金衢,长驱入侵。姚名达看到当地人心惶恐,奔走逃遁的情形,他慷慨陈词:“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抵抗,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嚆矢乎!”

6月11日上午,国立中正大学食堂墙壁上出现了一张大红布告,号召大家:“到前线去!到战场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发出这个号召的人正是姚名达。在这敌寇压境的危急时刻,姚名达毅然“投笔请缨”,联合数十名爱国师生,于6月13日发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名达被推选为团长,还编印了《战地服务团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

在战地服务团成立的当天深夜,作为团长的姚名达,以“显微”署名,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抗战檄文——《怎样打击东战场的倭寇》(未写完),后发表于1942年6月25日的江西《民国日报·专论》。姚名达以报刊专论的形式,吹响了奔赴前线抗战杀敌的号角。

文中,姚名达慷慨激昂地说:“我民众当此最后关头,尤需及时奋发,保卫家乡。我敢断言,我们如果各方面都能以打退倭寇为工作目的,不以对敌逃避为唯一办法,照着上列各点加紧实干,岂但东战场的胜利可以确保,就是把倭寇赶出江西去,亦只是时间问题。”

在他的热血感召下,国立中正大学师生踊跃报名,当天就确定了三十余人的队伍。随后,这群“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程。姚名达率领全团师生开赴江西抗战最激烈的新淦(今新干)、清江(今樟树)一带,他们下到营、连,给战士送药,为伤员服务,既做护理,又做宣传工作,使前方将士深受鼓舞。他们卓有成效的战地服务工作,深深感动了抗日军民,称赞他们是书生救国的模范。

1942年7月7日,姚名达率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新淦县深江乡石口村渡过赣江。到石口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本兵打斗起来。他从日本兵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在血泊中姚名达仍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姚名达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终年37岁。姚名达的壮烈牺牲为人们所震惊,仅《新华日报》就分别于1942年7月9日第二版,7月29日第三版,10月22日第二版,1943年3月26日先后4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姚名达的灵柩于1942年7月28日运抵泰和,沿途皆有公祭,国立中正大学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8月5日公葬于泰和县杏岭,墓碑上刻有“正气长存”四个大字。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2014年,姚名达被民政部公布为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姚名达,是现代史学与目录学领域的卓然大家,是文化战线上以笔为戈的忠贞志士,更是亲赴沙场、喋血抗敌的千秋烈士。赣水长流,其魂不灭。他以文人之肩担起战士之责,最终以师者之躯化作民族不屈的丰碑。

(本文综合整理了《共和国不会忘记——复旦大学烈士传》及《赣州一中(前身)师生的抗战文章选略》等内容)